

张大千和我父亲的二三事

◎ 史海钩沉 □ 曾东元

张大千是我父亲的姐夫。1920年张大千与我姑母结婚时，父亲仅13岁。我父亲在家是么弟，母亲过世早，长姐当母，关系非同一般，所以张大千对我父亲也十分关照。

1937年，我父亲从国民政府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毕业，被分配去浙江盐务局工作。要离开四川家乡，离开年近6旬的老父，父亲心中犹豫，想请大千仲兄张善子帮助，通过他过去在四川盐务部门任职时的老同事，就近安排去四川自贡等地的盐务系统工作。

张大千知道后就劝父亲说：“去浙江好，男儿志在四方嘛！我去过浙江杭州一带，那地方环境好，生活也方便，人也好相处。”父亲听了张大千的话，便和新婚的我母亲乘长江轮船经上海赴杭州，去浙江盐务局报到。

那时候不知道，日军很快把侵华战火扩大到南京以及江浙一带。父亲到杭州工作不到半年，就跟着当时的省政府向浙西南金华、龙游、龙泉一带撤退，一直退到江西。1945年8月抗战胜利，才从江西赣州返回杭州。

1945年10月，父亲调到上海盐务局工作，次年才见到正在上海筹办画展、八年未见的张大千。画展结束后，父亲又陪同张大千去了一趟抗战胜利后的杭州，专门去游览了西湖，看望了住在涌金门放庐的黄元秀等老朋友，还专程去游览了张大千曾经出家过的灵隐寺。

1945年12月，才到上海盐务局工作不到三个月的父亲，被通知将调动他去江苏徐州两淮盐务局任职。因为家小都在杭州，又听说徐州地处战争前沿，可能会打仗，父亲不愿去，就找时任民资四川建设银行董事长的堂叔曾宪九商量。曾宪九告诉他不能去。父亲就以身体有病为由，提出辞职申请，结果当局不仅不同意辞职，而且以“抗拒赴调”的名义，要给予处分。

不得已，我父亲又找了张大千。张大千爽快地点答应了，说“不要慌，我会帮你”。当时，张大千正在筹备以敦煌壁画临摹作品为主题的画展，打算在刚刚取得抗战胜利的北平和上海举办。不久，父亲接到了上海盐务局的通知，予以“免职处分”，等于给父亲辞职开了绿灯。后来父亲才得知，是张大千找了同乡好友，即正在北平参与国共和谈的国民党政府要员张群帮助做了工作，父亲才得以解脱，离开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机关，到四川建设银行担任了襄理的工作。

1946年10月至1947年5月，张大千先后在上海举办了《张大千敦煌壁画展》《张大千近作展》和《大风堂门人画展》。在此期间，他还带着他的弟子给父亲做了40寿宴。1948年，张大千到印度办画展，提出要我父亲跟他一起去印度，协助办画展，后因父亲放心不下杭州已有三个子女的家，未能随他出国。

1949年6月，张大千来到杭州游览西湖，顺便看望我的父母。在父亲陪同下，张大千一行泛舟西湖，踏勘雷峰塔遗址，漫步云栖竹径，还专门去了一趟灵隐寺，拜谒如来大佛。近中午边，张大千走出殿外，抬头久久眺望南北两高峰，并即兴作《重游西湖》诗一首：

三年我不到杭州，重见青山水上浮。高并两峰云暖暖，阴沉一径竹修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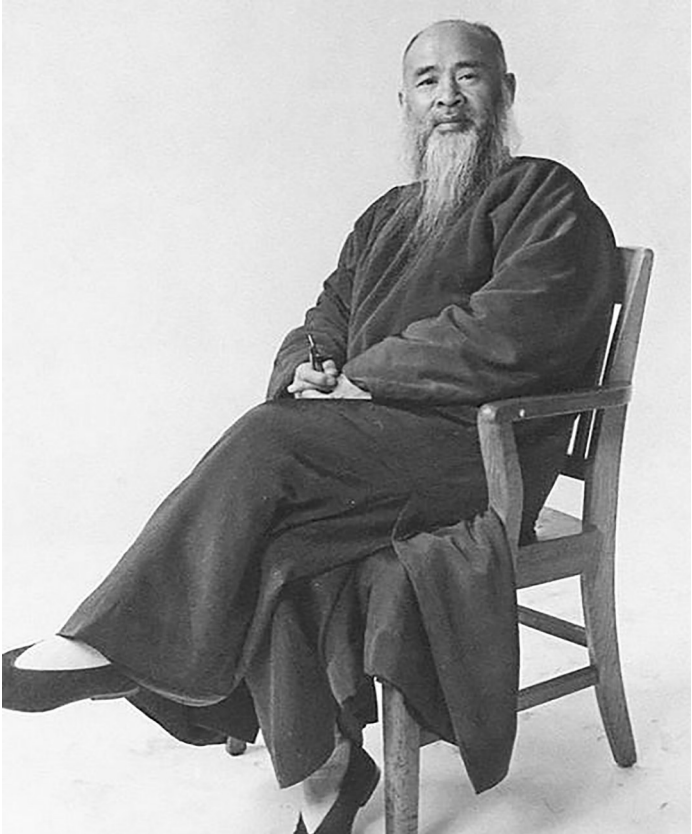
黄妃塔已成秋梦，忠烈祠空依旧游。瓜皮艇子无多大，载酒还教一日留。

落款为：己丑夏大千张爱

1950年12月，张大千在国民党高官张群的“安排”下，匆忙去了台湾，但大部分家小留在了成都。之后他又辗转香港、阿根廷和巴西，最后在巴西购地修建八德园，定居达22年（1954~1976）。

听父亲说起，张大千对中国共产党是有好感的，当时对是否要离开大陆，也是非常犹豫的。这是因为年轻时（1915），张大千就读重庆求精中学，教他国术体育的老师就是刘伯承。那时刘伯承在国民党元老、重庆镇守使熊克武部任团长，为在学生中开展反袁救国运动，奉命到求精中学任短期的军事教官。由于师生关系融洽，张大千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记叙了刘伯承对他的教诲，尤其是刘的家国情怀对他的影响。1916年暑假，张大千与几位同学还相约去看望已离开求精中学的刘伯承。抗战期间，刘伯承成为八路军的主要将领、抗日名将，张大千多次与父亲讲起他对刘伯承及中国共产党的敬仰之心。

1949年2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当他听说古都未发生战事，文物保存完好，思想上对共产党非常佩服。当时，张大千临时居住在香港九龙亚皆老街。3月的一天，廖仲恺遗孀何香凝到访他的寓所，说她将应邀赴北京出席新政协，拟请张大千作一幅，作为带给毛泽东主席的礼物，张大千当场答应。三天后，他精心创作的《荷花图》交由何香凝带给毛泽东，这是一幅高132厘米，宽60.7厘米的水墨淡彩画，墨色浓郁



张大千

的荷叶之间，一朵白莲傲然而立，给人以生机盎然、万象更新的印象。画作左上方，张大千提款：“润之先生法家雅正，己丑二月，大千张爱”，显示了作者对受赠者的高度尊崇。

《荷花图》现收藏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但另一方面，他与国民党的一些高官如于右任、张群等有多年交情，张大千十分注重情感，致使他难以下决心留在大陆，而长期侨居巴西。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周总理多次接见张大千在国内的亲属，并安排他们去国（境）外见张大千，同时也派专员去做张大千回国的的工作。张大千也有落叶归根回大陆的想法，无奈“文化大革命”爆发，张大千最终在1976年以77岁高龄，迁回台湾定居。

1981年，表姐张心庆廖承志副委员长帮助安排，与张大千恢复了联系，并打算次年转道香港赴台湾探望，我父亲准备了几盒杭州的西湖龙井茶，拟托表姐捎去。由于当时两岸尚未开放三通，而且表姐具有成都市人大代表的身份，虽然是张大千的女儿，但在香港仍被台湾当局卡住。以后又转道美国，期望能在美国与张大千相聚，不料经医生建议，张大千体弱多病，不适合离开台湾出行，表姐只得在纽约与大千先生通了电话，转达了父亲的问候。1983年4月，张大千在台湾去世。自1949年一别，父亲再也没有见到过张大千。

◎ 史林偶拾

我是属于中国的

□ 唐宝民

谈家桢是我国著名的遗传学家和教育家，中科院院士。早年他曾两次受到美方人士的挽留，有机会留在美国，但因为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毅然选择了回国，为中华民族的科研事业贡献了大半生的精力。

1934年，谈家桢告别家人，登上了“胡佛总统号”游轮，前往美国摩尔根实验室学习。在那里，他赢得了包括摩尔根在内的师长们的青睐，尤其是导师杜布赞斯基教授，对谈家桢更是欣赏有加。因此，1937年，当谈家桢完成了学业之后，爱才惜才的杜布赞斯基教授希望谈家桢能继续留在实验室工作，谈家桢虽然很感动，但他心中有一种报效祖国的情怀，便深怀歉意地对自己的恩师说：“我不能一味地站在果蝇遗传学研究领域里。中

国的遗传学底子很薄，人才奇缺。要发展中国遗传学，迫切需要培养各个专业方面的人才。我是属于中国的。”

回国后的谈家桢，投入到了教学、科研工作中，并取得了很大成就。1948年，谈家桢作为中国遗传学唯一的代表出席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那时，内战已经打得很激烈了，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执政已成定局，美国同行便劝谈家桢干脆在美国定居，他们说：“你是摩尔根的弟子，回去后会有什么好果子吃？”谈家桢再次拒绝了美国人的挽留，说道：“不管如何，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一定要回到中国去！”1948年底，谈家桢满怀信心地回到了祖国。

谈家桢的操守及爱国精神，印证了老一辈学人的无私风范和家国理念，他的选择，折射出一种极其高尚的情怀，那就是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

你不要夺走我的快乐

□ 任万杰

曾任清代户部尚书的曹振鏞，在他没有发迹的时候，因为听闻黄山的秀美风光，喜欢游玩的他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游黄山，写下“崖巖壁削猿猴愁，死生由命悉负之”，可见当时游黄山之难。

曹振鏞和当地人下山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樵夫，在崎岖的山路上，他背着一大捆柴，步履蹒跚小心翼翼地往下走，看样子已经五十多岁了。樵夫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曹振鏞和当地人坐在樵夫的身旁，与他聊了起来。樵夫说了自己的孩子和收入，非常高兴，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樵夫又起来背柴，曹振鏞动了惻隐之心，伸手接樵夫肩上的柴。曹振鏞想自己年轻，而樵夫年龄大，自己帮他

背一程。

没想到，樵夫毅然拒绝了。曹振鏞说：“我感谢你背得很痛苦，没别的意思，只想帮帮你。”樵夫挥一挥布满老茧的手，呵呵笑着说：“谢了！谢了！你不要夺走我这会儿的快乐。”

看着樵夫沉重地走远，曹振鏞叹了一口气说：“撒谎，这么重怎么会快乐呢？”当地人说：“不，樵夫是快乐的。”曹振鏞不明白地问为什么呢？当地人说：“大人不知道我们的快乐，背上有东西，就是有收获，可以为家人带来安全，带着希望和满足，虽然累点，但很充实有盼头，当然很快乐。”

生活中，我们有时感觉别人很苦，其实带着希望和收获，怎么会苦呢！那是一种满足的快乐。

季羨林“蹭课”收获多

□ 刘跃

季羨林是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他无论是求学期间还是从教之后都谦逊好学，乐于旁听其他老师的授课。

季羨林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就读，除了学习本系的必修和选修课程外，还经常利用富余时间去旁听其他老师的授课，如俞平伯、朱自清、郑振铎、冰心等人的课。他曾旁听过时任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季羨林回忆说：“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光大道。读他的文

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季羨林当时就对梵文产生了兴趣，1935年深秋，他清华毕业后去德国哥廷根大学就读，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语等冷门学科，成为这方面的著名学者。

1946年，季羨林从海外回国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1947年，汤用彤教授在北大开设了“魏晋玄学”这门课，课堂就在他办公室的楼上。在当时，一位教授听另一位教授的讲课，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但季羨林并不在意，毅然取得了汤用彤的同意，成为他班上最忠诚的学生之一，一整年都没有缺过一次课，而且每堂课都工整地做听课笔记，巨细不遗，最后记了一大本笔记，此后一直保存着。

徐悲鸿名字的由来

□ 冯忠方

徐悲鸿是中国现代杰出的绘画艺术大师、美术教育家。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擅长人物、走兽、花鸟，尤以画马驰名中外。他还创作了《九方皋》《傥我后》《愚公移山》等寓有进步思想的历史画。

这样一位艺术大师，却并非出身于丹青世家。他是江苏宜兴人，原名徐寿康。父亲徐达章是位私塾先生，能诗文，善书画。小悲鸿6岁时跟着父亲读四书五经，9岁起正式从父习画。17岁以后曾先后担任家乡一所中学和两所女子学校的图画教员，他家距这三个学校有30多里路，由于家境贫寒，他从不乘船搭车，都是徒步往返。教书虽然兢兢业业，但由于家里穷，没有进过正规学校，也就没有学历和文凭，为此常遭人们的冷遇。

为了在社会上谋生立足，他便想进“洋学堂读书”，但他的父亲拿不出钱。于是他便去向别人借钱，可是谁也看不起这个穷小子，拒绝借给他钱。这使他深感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且前途渺茫，不禁悲从中来，犹如鸿雁悲鸣。于是，他把原名徐寿康改成徐悲鸿。此后他一直以哀鸿自诩，并以此自勉自警，发愤绘画，终成一代驰名中外的艺术大师。

◎ 烛照西窗 □ 江南布衣

1988年，湖州与毗邻的杭州、嘉兴之间曾爆发过“蚕茧大战”。杭嘉湖蚕茧的主要产区在湖州，为了吸引蚕农跨区投售，邻近两地都暗中抬高了蚕茧的收购价。湖州市政府下令各职能部门设卡堵截，防止本地蚕茧外流。

当时我在湖州市某部门工作，我们的任务是乘钟师傅的汽艇昼夜不停地在德清与余杭交界的东苕溪上巡逻，拦截外出售茧的本地农船。湖州许多地方当时都不通公路，领导到乡镇视察、记者下基层采访，都需钟师傅的汽艇接送，耳濡目染，他肚皮里藏了不少掌故轶闻。那天夜里，汽艇在江上兜了几个圈子，平安无事，便靠泊在岸边的柳树待命。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在船尾抽烟的钟师傅见我们都昏昏欲睡，便打破沉默说道：“你们谁知道，300多年前淹死在我们脚下这条江里是哪个名人？”在我们好奇的追问下，他讲述了藏在江底的一段秘史。

洪昇，字昉思，浙江钱塘人，顺治二年（1645）生人，死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享年一甲子。洪昇24岁入北京国子监为监生，后因父妾和同父异母兄弟的挑唆，被逐出家族，在外漂泊十年，完成了旷世巨作《长生殿》。康熙二十八年，因在佟皇后丧期演戏，许多人受牵连遭惩处，洪昇也被革去监生资格，遣返原籍，布衣终生。康熙四十三年，江南提督张云翼邀请洪昇到松江的提督府，“延为上宾，开长筵，盛集文宾将士，观昉思所作《长生殿》戏剧以为娱”。时任江宁织造监督的曹寅得知后，邀洪昇到自己在南京的宅邸搬演《长生殿》。据说，演出时曹寅特地准备了两部剧本，一本置于自己面前，一本放在洪昇的席上。每当舞台上的优伶唱完一折，两人便讨论剧中的音律节奏、字句声腔，时而校补改订，举凡三昼夜才将整

出戏演完。这是洪昇晚年难得的赏心悦目之事，做主人的曹寅不仅知音善度，提供中肯内行的鉴赏意见，还馈赠了极其优渥的程仪。

曹寅是康熙的亲信，在江宁织造任上长达数十年，从他给康熙那些连篇累牍的奏折中可以看到，有许多看来不该出现在奏折里的琐碎小事，诸如江南的风俗人情、三教九流、街谈巷议、诗酒趣闻，曹寅都密封包扎用快马送往京城。他这样做自然是得到康熙的授意和鼓励，远在北方的皇上喜欢看这些花边新闻，大概不会是为了解闷逗乐，他是要把江南文人的一举一动都掌握无遗。所以说曹寅还有一个秘密使命，观察江南知识分子的动向，并担负起对他们的“统战”工作。洪昇一生最好的时间是在京城度过的，听说过曹寅能直达天听的传闻。落难沉寂多年以后，突然有官员接二连三想到他，排演他的成名作，延为上宾，馈赠丰厚，难免会浮想联翩：莫非京城大佬还记得洪某的盖世才华，欲重新启用，让地方官员借演戏先摸摸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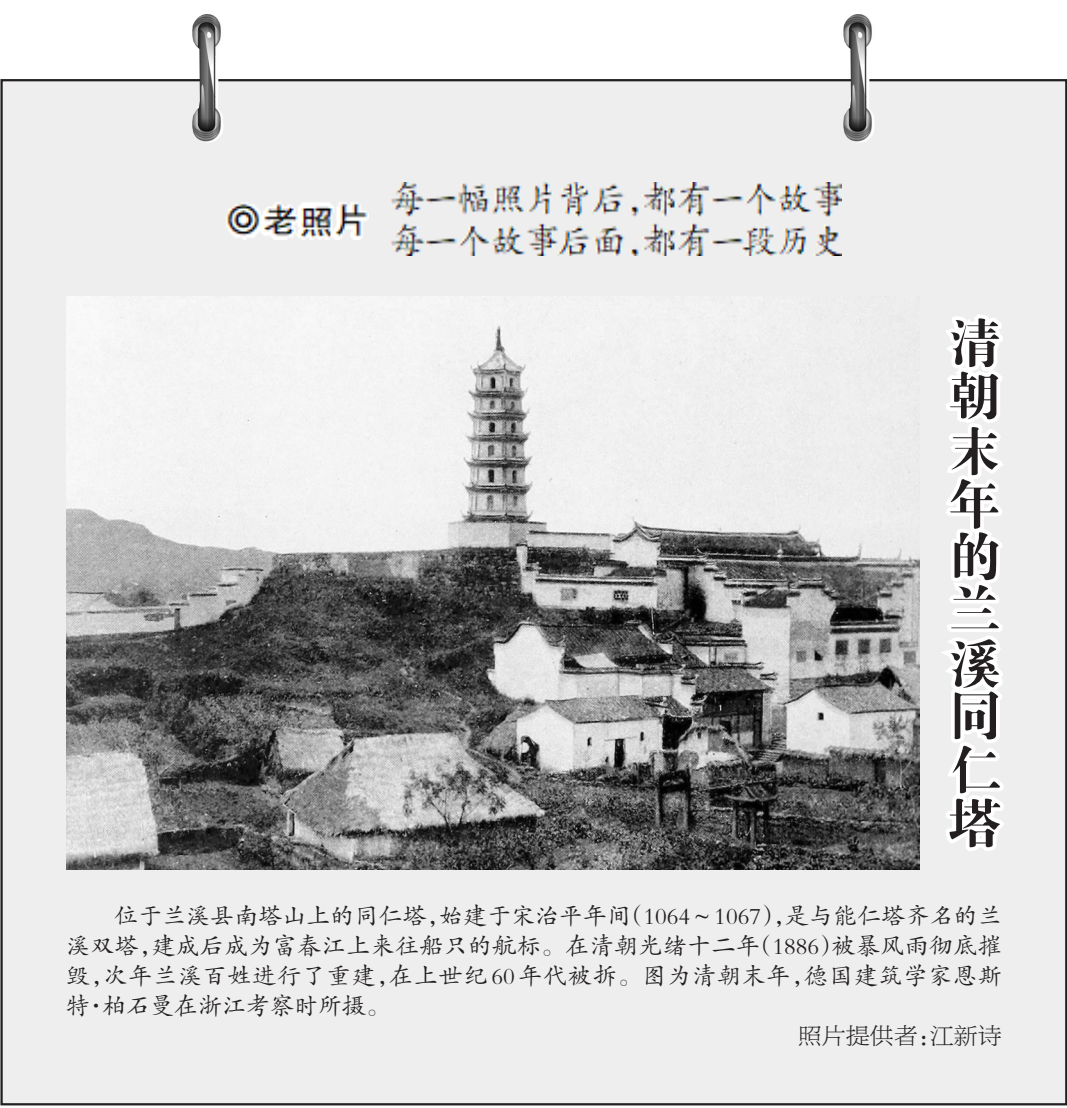
这次出门名利双收，还留下了悬念好梦，因此洪昇的心情特别好，回杭州西溪老家途中，船经湖州乌程时不忘带上几盆本地盛产的好酒，在舱里小酌，自得其乐。船经东苕溪时洪昇独自出舱小解，醉意朦胧，失足坠江。恰好此时江上刮起一阵大风，把船上的灯烛都吹灭了，大江浩荡，长夜如墨，众人手忙脚乱，还是没能救起溺水之人。老朋友、著名学者王士禛得知此事，感慨道：“昉思遭天伦之变，佛郁坎壈缠其身，终从三閼于汨罗，仅以词曲传耳，悲夫！”诗人吴宝崖有《舟过乌程吊昉思》：“烟水依然拍野塘，饥驱客气倍堪伤。乌程酒醒漏将促，白舫灯昏风故狂。失足久无人济溺，招魂剩有鬼还乡。江南儿女应传语，分取钗钿吊七郎。”

洪家是钱塘望族，外祖父黄机在康熙朝官

至文华殿大学士，洪昇娶了舅舅的女儿，自家的外孙兼孙女婿想进国家重点大学，老爷子当然要助一臂之力。或许这些来得太容易了，也许因屡试不第心情不畅，在京城后期，洪昇有点放纵自己，“交游宴集，每白眼卧坐，指古摘今”。好友徐嘉炎在《长歌行送洪昉思南归》中也提到“好古每称癖，逢人不讳狂”。尽管后来被削籍回乡，终生不仕，贫困潦倒，但他老人家依然我行我素，性情不改。康熙三十六年，江苏巡抚宋荦命人排演《长生殿》，事后设宴招待有关人士，据说洪昇在宴席上“狂态复发，解衣箕踞，纵饮如故。”

查嗣璣出生于宁海望族，受学于著名学者黄宗羲，赐进士出身，入南书房行走，相当于皇帝身边的机要秘书，前程似锦，应同乡洪昇之邀国丧观剧被革职。查嗣璣从此隐退故里，并将名字改为慎行，字悔余，寓示自己这辈子都要“痛悔之余，谨言慎行”。即便这样小心翼翼也没用，雍正四年其弟查嗣庭出任江西主考，因所出试题“维民所止”涉嫌诽谤被拿问，查慎行一支集体被捕，幸亏鞫审大臣回护才免于牢狱之灾。因受文字狱牵连，已死去多年的查慎行被掘墓扬灰。

如果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会毫不迟疑地将票投给洪昇。那位“避席闻畏文字狱”的慎行先生不敢写诗著文，不敢酬答唱和，处处谨言慎行，活得多么窝囊憋屈，与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同样是被革职返乡，相比之下，洪昇的活法更有样。他率性而为，不拘小节，解衣箕踞，指古摘今，纵饮如故，虽然有点张狂，但活得真实，活得痛快，活得受人敬重。能被后人与《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并称“南洪北孔”，成为中国戏曲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足以证明不虚此生。



清朝末年的兰溪同仁塔

◎ 老照片 每一幅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后面，都有一段历史



位于兰溪县南塔山上的同仁塔，始建于宋治平年间（1064~1067），是与仁塔齐名的兰溪双塔，建成后成为富春江上来往船只的航标。在清朝光绪十二年（1886）被暴风雨彻底摧毁，次年兰溪百姓进行了重建，在上世纪60年代被拆。图为清朝末年，德国建筑学家恩斯特·柏石曼在浙江考察时所摄。

照片提供者：江新诗